

说 与 做

——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

人家说了再做；我是做了再说。

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；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。

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，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，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。那时候，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。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，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。仰之弥高，越高攀得越起劲，钻之弥坚，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。他想吃尽、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，炯炯目光，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。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，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。1930到1932年，“望闻问切”也还只是在“望”的初级阶段。他从唐诗下手，目不窥园，足不下楼，兀兀穷年，沥尽心血。杜甫晚年，疏懒得“一月不梳头”，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，他是无暇及此。闻一多先生的书桌，任它凌乱不堪，众物腾怨，闻先生心不在焉，抱歉地道一声：“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。”饭，几乎忘记了吃，他贪的是精神食粮；夜间睡得很少，为了研究，他惜寸阴、分阴。“红锡包”香烟，成为不离手的膩友，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，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，因它大开光明之路，“漂白了四壁”。

不动不响，无声无闻。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密麻小楷，如群蚁排衙。几年苦功，凝结而成《唐诗杂论》的硕果。

他并没有先“说”，但他“做”了。做出了卓越的成绩。

“做”了，他自己也没有“说”。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。十年艰辛，一部“校补”赫然而出。别人在赞美，在惊叹，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，也没有“说”。他又向《古典新义》迈进了。他潜心贯注，心会神凝，成了“何妨一下楼主人”。

“做”了再“说”，“做”了不“说”，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——作为学术家、思想家的方面。

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，——作为政治家、革命家的方面。

这个方面，情况就迥乎不同，而且一反既往了。

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，闻一多先生，“说”了。起先，小声说，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；后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他向全国人民呼喊，叫人民起来，反对独裁，争取民主！

他在给我的信上说：“此身别无长处，既然有一颗心，有一张嘴，讲话定要讲个痛快！”

他“说”了，跟着的是“做”。这不再是“做了再说”或“做了也不一定说”了。现在，他“说”了就“做”。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，这是人格的写照，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。

1944年10月12日，他给了我一封信，最后一行说：“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，代表我最近工作之一，请传观。”

这是为争取民主，反对独裁，他起稿的一份政治传单！

在李公朴先生被害之后，警报迭起，形势紧张，明知凶多吉少，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，大骂特务，慷慨淋漓，并指着这群败类说：你们站出来！你们站出来！

他“说”了。说得真痛快，动人心，鼓壮志，气冲斗牛，声震天地！

他“说”了：“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，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。”

他“做”了，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，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，昂首挺胸，长须飘飘。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，实证了他的“言”与“行”。

闻一多先生，是卓越的学者，大勇的革命烈士，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。

他，是口的巨人。他，是行的高标。

1980年1月25日

（辑自《臧克家散文小说集》）